

# 敵我意識的陷阱

• 王曉明

## 現代文學史上最荒唐的論戰

因為寫魯迅的思想傳記，我最近重讀了1928年「革命文學」論戰的有關文字，也順便瀏覽了創造社圍攻魯迅的那些文章。以前讀它們的時候，多是注意創造社的人說甚麼，這一回就換個角度，專看他們怎麼說，結果是愈讀愈驚訝，他們抨擊魯迅的時候，態度怎麼都那樣兇？

在創造社同人中，最先批評魯迅的大概是成仿吾，在魯迅的小說集《吶喊》剛出版的時候，他就撰文指摘，判定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「淺薄」和「庸俗」的<sup>①</sup>，口氣相當武斷。到1927年初，他更將矛頭指向魯迅的人生態度，說他表現了一種「以趣味為中心的生活基調」，這基調「所矜持着的是閑暇，閑暇，第三個閑暇。我們知道，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，有閑階級就是有錢階級」<sup>②</sup>。這樣的推論就相當嚇人了，「以趣味為中心」就是「有閑」，「有閑」就是「有錢」，「有

錢」者，資產階級也。根據成仿吾當時信仰的階級鬥爭的理論，對資產階級該怎麼辦，是不言而喻的。不過，他沒有點魯迅的名，也沒有把那個推論的結論全說出來，畢竟還算客氣。到1928年初，比他更年輕的一批創造社的新成員就更厲害了。先是馮乃超，說魯迅的文字反映了「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」，只會「無聊賴地」唱幾句人道主義的空話，言下之意，是應該被淘汰了<sup>③</sup>。接着是李初梨，見有人稱魯迅是「我們時代的作者」，就來勢洶洶地詰問：「魯迅究竟是第幾階級的人，他寫的又是第幾階級的文學？」<sup>④</sup>只要讀過他們當時發表的那些論述無產階級革命的文字，譬如成仿吾那個「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」的著名的宣言，你就不難體味出，這種對魯迅的階級身分的追究，是包含了甚麼樣的意思。1928年秋天，郭沫若乾脆把這層意思明白地說了出來：「他〔指魯迅〕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。資本主義對於

郭沫若乾脆明白地說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。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，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就是二重的反革命。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分子！



郭沫若等人聲討魯迅時，「殺氣」騰騰。

社會主義是反革命，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就是二重的反革命。以前說魯迅是新舊過渡時期的游移分子，說他是人道主義者，這是完全錯了。他是一位不得志的 fascist！」<sup>⑤</sup>竟然將魯迅罵成法西斯分子！難怪魯迅要說，倘若成仿吾革命成功，他是「至少也總得充軍到北極圈內去」的<sup>⑥</sup>，以他那樣的閱歷和眼光，怎麼可能從那些批評他的文字當中，嗅不出隱隱的「殺氣」呢？

創造社的人這樣咬牙切齒，總是和魯迅結過甚麼大冤仇吧，但仔細分析起來，似乎又並非如此。馮乃超和李初梨是剛從日本回國，從沒有和魯

迅打過交道。郭沫若就更不用說，在1927年秋天，他還約請魯迅和他一起恢復《創造週報》，在上海的報紙上發聯名宣言，預告《創造週報》的復刊，分明是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成仿吾對魯迅是早有不滿，但那多半是文人相輕式的嫉妒，他也並非只對魯迅一個人有這種感情，更絕非只有他一個人有這種感情。看看當時其他作者在這類事情上的表現，我想是可以肯定，單靠這種不滿並不能釀成那樣大的怒氣。那麼，這怒氣又是來自何處呢？

我想來想去，只能找出這樣一個原因：在1927年底和1928年，創造社的人大概是認定了魯迅是他們的敵

人。在人與人的各種關係當中，敵對關係恐怕是最容易使人喪失理性的，因為構成這種關係的雙方必然在主觀上不願意共存，每一方都想以對方的滅亡來作為自己生存的保障。這就將功利性的較量抬高為生存的最高意義，世界的圖景變得愈來愈簡單，只有一個我，對着一個敵人：「我」的思緒也愈來愈單一，就是盡一切所能去消滅「他」。因此，你一旦陷身敵對關係，你也就把自己推進了這樣一種緊張興奮的情景：你必然會全神貫注地盯住你的敵人，除了他，你甚麼也不想看，你甚至會拿你和他的關係為唯一的尺度，衡量世界上的所有東西。你也必然不能真正理解你的敵人，因為實際利害激發出來的仇恨早已模糊了你的雙眼，使你不能看清他的複雜面貌。即使你本來對他有深入的了解，一旦視他為敵人，你這了解也會不知不覺地消退，直至將他簡化為一個功利意義上的對手。你更必然會失去對自己的約束，既然他是敵人，那就無論對他用甚麼極端的手段，你都理直氣壯，問心無愧。而到這一步，你的理性也就喪失得差不多了。

我以為，郭沫若和成仿吾等人聲討魯迅的時候，正是陷入了這樣的一種情景。只有將魯迅判定為敵人，他們才會那樣迅速地產生強烈的敵意：也只有這樣的敵意，才能使他們完全不顧魯迅的實際情形，甚至不顧他們原先對他的認識，一徑要將他釘死在「反革命」的木樁上。不用說，也只有這種一心要從文壇上除去魯迅的激情，才能使他們那樣放縱筆墨，毫不掩飾自己的怒意。創造社這些人，大多是聰明而有才能的，在差不多一年的時間裏，竟然都不能覺察自己對魯迅的圍攻有多麼荒唐，恐怕是只有強

烈的敵對意識，才能使他們如此遲鈍吧。也惟其這樣，一旦有誰能向他們證明，魯迅並非敵人，甚至還是可以聯合的盟友，他們對魯迅的反感，就會迅速消退。1929年共產黨在上海的負責人批評創造社（當時圍攻魯迅的人，大多是共產黨員）對魯迅的攻擊，主要的一條理由，就是說他們看錯了敵人，不應該把主要的矛頭對準魯迅。而凡是接受這個批評，承認自己錯看魯迅的人，譬如馮乃超和李初梨，也果然迅速改變了對魯迅的態度，甚至願意尊他為「左翼作家聯盟」的領袖。就是成仿吾，後來也將魯迅看成可以信任的同志，甚至通過他去尋找上海的共產黨組織。這不正從另一面證實了，他當初的那份怒氣，正有一大半是來自「魯迅是敵人」的判斷嗎？在中國新文學的眾多文學論戰中，創造社對魯迅的圍攻可說是最滑稽的一場，現在可以看清楚了，這場滑稽劇的主導演，正是郭沫若他們頭腦中那個過分膨脹的敵我意識。

## 「正義」與暴力

我由此想到許多事情。一旦確立了自己的立場，就習慣性地將與自己不同的其他立場看作仇敵，就自覺地擺出與它敵對的姿態，就盡全力用一切手段去攻擊它——倘說郭沫若他們這一次是顯出了這種敵我意識的荒唐的一面，那我們從其他的事情上，是不是也能看到這同樣的一面，或者不同的另外幾面呢？比方說，陳獨秀和胡適他們在《新青年》上提倡「文學革命」，那樣激烈地否定中國的古典文學傳統，將它說得一無是處，陳獨秀甚至公開宣稱，在用白話取代言

創造社對魯迅的圍攻可說是最滑稽的一場，這場滑稽劇的主導演，正是郭沫若他們頭腦中那個過分膨脹的敵我意識。

這件事情上，「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」<sup>⑦</sup>，錢玄同更乾脆主張廢除漢字，他們這種決絕的態度背後，是不是也正有某種敵我意識在激勵呢？「文學研究會」成立之初，那樣猛烈地攻擊「鴛鴦蝴蝶派」之類的通俗文學，有些人一下筆，就是罵不絕口，恨不能一個早上就把它們掃除乾淨，這是不是也表現出一種與對方勢不兩立，必得將它打倒，自己才能發展的心態呢？在30年代，魯迅會那樣猛烈地抨擊「第三種人」，當時的大多數左翼作家，也都會一致贊同他那種「敵我之外不存在第三者」的推論，就更是清楚顯示了這種敵我意識的普遍存在。難怪左聯的雜誌上竟會登出這樣威嚇自由主義作家的詩句：「當心，你的腦袋一下就要變作剖開的西瓜！」<sup>⑧</sup>我甚至覺得，從20年代晚期開始，文學作品中會出現那麼多對於「正義」的暴力的宣揚，那麼多對於「正義」的人事的無條件的歌頌，那麼多對於「邪惡」勢力的臉譜式的醜化，恐怕都和作家頭腦中敵我意識的膨脹，有很大的關係吧。

當然，只要人類還不能消除自己的某些愚蠢的本性，人和人就難免要經常陷入敵對的處境，源源不斷地孕育出各種各樣的敵我意識。看到它給中國新文學的歷史打上那樣深刻的烙印，對二十世紀的中國作家產生那樣強烈的影響，本來似乎是不應該驚訝的。但是，我忍不住還要問一句：你是不是覺得這塊烙印太觸目了一些，這種影響也太強大了呢？倘若確實如此，那我們是不是應該探究一下，究竟是哪些歷史和現實原因，哪些具體的環境和精神因素，使二十世紀的中國作家特別容易滋生敵我意識：這種意識又特別容易迅速膨脹，致使許多

作家即使在從事文學活動，也情不自禁要去尋找和設定形式式的「敵人」呢？

1992年4月香港

### 註釋

① 成仿吾：〈《吶喊》的評論〉，《創造季刊》2卷2期（1924年1月），此處引自《魯迅全集》第二卷（香港文學研究社版），頁457。

② 成仿吾：〈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〉，《洪水》3卷25期（1927年1月），此處引自《魯迅全集》第四卷（香港文學研究社版），頁496。

③ 馮乃超：〈藝術與社會生活〉，《文化批判》創刊號（1928年1月），此處引自《魯迅全集》第四卷，頁502。

④ 李初梨：〈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〉，《文化批判》第二期（1928年2月），此處引自《魯迅全集》第四卷，頁503。

⑤ 杜荃（郭沫若化名）：〈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〉，《創造月刊》2卷1期（1928年8月），此處引自《魯迅全集》第四卷，頁495。

⑥ 魯迅：〈「醉眼」中的朦朧〉，《魯迅全集》第四卷，頁56。

⑦ 陳獨秀：〈答胡適之〉，《新青年》3卷1期（1917年3月）。

⑧ 芸生：〈漢奸的供狀〉，《文學月報》1卷4期（1932年11月），此處引自《魯迅全集》第四卷，頁551。

這種敵我意識的普遍存在。難怪左聯的雜誌上竟會登出這樣威嚇自由主義作家的詩句：「當心，你的腦袋一下就要變作剖開的西瓜！」

王曉明 任教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，著作有《所羅門的瓶子》（文學批評）、《潛流與漩渦》（文學批評）和《追問錄》（散文）等。